

中山先生的又一好伴侣

——陈粹芬

文/高云贵



中山先生和陈粹芬夫人合影照

电 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此时此刻，再次激起了我们对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推翻清王朝的元勋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伴侣陈粹芬夫人的思念之情。

中山先生一生曾三次婚姻：一次是孙、卢联姻于香山（即中山县），乃父母作主；二次是孙、陈联姻于香港，乃自由恋爱；三次是孙、宋联姻于日本东京。卢夫人与宋夫人正史皆有记载，惟陈夫人连野史也少有叙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史界的一大憾事！

我祖父高锦书兄弟 10 人中就有 6 人毕业于中山先生创办的著名的黄埔军校，且我祖父在抗战期间长

期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供职，因此我通过先辈们的早年关系而和诸多出身于黄埔的国共两党中的高级将领有联系和交往。在这些黄埔先辈中有两位著名抗日将领和我关系尤为密切，其一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 23 代后裔，爱国民主人士文强先生。文老的父亲文振之公，当年乃是孙

（文）黄（兴）蔡（锷）等伟人的好朋友，这使得青年时期的文强和孙中山先生、陈粹芬夫人即有交往；另一位是原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爱国将领李以助将军，由于陈夫人的养女孙容是李将军的英语老师，而陈夫人的女婿孙乾又是李将军在陆军大学学习时的兵器教官，这使得李将军和陈夫人也颇多交往和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笔者通过先辈们的早年关系，和文、李两位著名抗日将领多次书信来往，电话交流更不计其数……这些，使我了解到陈粹芬夫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迹。这位“与其无义而名兮，宁穷处而守高”的巾帼英雄，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陈粹芬夫人（流亡日本时，取名香菱），原籍厦门同安，1873 年出生于香港新界之屯门，排行第四，人称四姑娘。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被尊称为陈四姑。陈四姑从 1891 年至 1913 年，一直追随襄助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斗争。积极参与起义行动，如私运军火于广州，任交通通讯于日本，随军进攻于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宣传反清檄文及三民主义于马来西亚之庇能及新加坡。22 年如一日，历尽艰辛，为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年，中山先生在香港宣传革命就住在屯门红楼，红楼因以红砖砌成而得名。它靠近海边，当时革命青年来红楼会见孙中山，多是在夜间乘小船。陈少白、尤烈、陆皓东（系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设计者，亦是为共和牺牲第一人）、冯自由、郑士良等人曾多次来此。那时，陈夫人服务于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纲纪慎会），经陈少白的介绍，陈夫人认识了孙中山。中山先生一见到陈粹芬，就叙述其壮志，决心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决心效法洪秀全、石达开，“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当时中山先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经过不断交往，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陈夫人

19岁时,终于成为革命的伴侣。这一年中山先生26岁,正就读于西医学院还差一年毕业。卢夫人也就在这一年生下了孙科。

1895年广州起义前,中山先生行医于澳门和广州。由于他对内科、外科、妇科造诣较深,医术高明,使得其诊所闻名遐迩。中山先生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对患者实行义诊,此举受到群众的欢迎。中山先生在两年的行医中,还与红楼诸友完成了改良中国政治与经济计划(主要内容为“四尽”,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要求政府采纳实施。中山先生与陆皓东带着计划去会见两广总督李瀚章,李瀚章要他俩赴天津面呈北洋大臣李鸿章(世人称为“上李鸿章书”。)他俩到达天津呈上计划后,腐败的清廷根本不予重视,回到广州后,中山先生决定师法洪秀全,采取武装革命。随即将设在檀香山的兴中会总部移设香港,准备武装起义。在筹备武器弹药时,中山先生认为陆皓东虽年轻却有胆有识,由他来主持其事。陆皓东确实能干,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运回武器好几批。不幸的是,在最后那次转运武器中,在广州长堤附近被巡防营缉获而被捕,武器全部没收。然而,当时由陈夫人经手分藏各处的武器,如短枪、短刀、子弹、炸药、手榴弹等,均安全无事。由此可见,陈夫人有勇有谋,才略超人。

由于人们都知道她是中山先生的夫人,又是他的护士和卫士,所以在得悉陆皓东被捕后,她即不敢回诊所(药局),也不敢回家,只好浪迹亲友家听消息。11月下旬,三合会首领郑士良派人秘密通知,陆皓东被斩首。随后又接三合会另一首领深夜通知,说缉拿中山先生的文告已发出。于是,中山先生和陈夫人在悲

痛默祷陆皓东中,匆匆收拾行装深夜逃走。同时派专人至家乡(香山县),让卢夫人带着孙科迅速赴澳门避难。两天后,他们全家会聚于澳门,凄然相对。数日后又悉,他们当晚若迟走几小时,就会被捉拿归案了。这样广州起义原计划集中三合会百余人相机伏击两广总督李瀚章,不幸失败。这一失败,导致清政府对中山先生的不断追捕,直到它覆灭前从未中止过。也就是说,此后的15年中,中山先生与陈夫人都是过着流亡的艰苦生活。

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粹芬流亡日本的横滨时间较长。当时所有追随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来此,他们的吃饭、穿衣都是由陈夫人承担,她实际上好似一个保姆。另外,中山先生将兴中会分会设在横滨,日本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都与孙中山常来常往,一切接待工作都由陈夫人操持。在此过程中,陈夫人亦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00年由于清廷丧权辱国,广东人心惶惶,中山先生在日本曾策划广东独立、推翻清廷的运动。广东三合会首领郑士良,愿在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举行惠州起义。当时三合会在惠州地区非常活跃,但武器很差。为解决这一问题,香港兴中会通过海员工会从美国、加拿大等国购买武器。所有运输武器的邮船经过横滨,都是由陈夫人亲自联络与接洽,然后利用香港深圳河通过宝安县转运惠州地区。作为一个女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当然是非常吃力的,陈夫人乐此不疲。

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中,由于环境所限,在他遥控指挥下,举行的多次起义,均遭失败,但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中山先生和陈夫人都亲自上阵督战,取得了攻克该关的胜利。革命军占领

镇南关6天,清军反复增兵反攻,均被击退。第6天增兵至千余人,中山先生下令撤退到安南(今越南)境内。这一战,起义军声威大振,参加起义军的很多人,是追随中山的爱国华侨及粤桂青年学生。陈夫人随军担任“伙头军”,为军队煮饭送饭,确实很辛苦,但为了救国,她是什么艰难困苦都能忍受的。

1912年,清帝宣统被迫退位,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中山先生在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由于工作需要,聘请老友宋耀如的女公子宋蔼龄任中山先生的秘书。翌年,中山先生亲作“红娘”,介绍宋蔼龄与孔



孙中山一生照片,此影可谓最早。宋庆龄摄于十八岁,其时大概在檀香山

祥熙结婚后,继聘宋蔼龄的二妹宋庆龄任秘书。孙、宋在长时期的合作共事中,彼此志同道合,发展成为情同意合。在彼此未结为伉俪之前,中山先生分别征求卢、陈两位夫人的意见后确定:孙、卢离婚,孙、陈分居。孙、宋联姻后,陈夫人单身赴南洋,定居于马来西亚之庇能,因为她在反清斗争时,曾多次来到庇能,并深受各界侨胞的爱戴。陈夫人隐居庇能后,抱养了甫出生的一位姓苏的华侨女婴为女儿,取名孙容。母女俩在庇能的生活,除了受到当地华侨及当时的老兴中会员、同盟会员、

国民党员的照顾外，也受到孙科的接济。孙科也曾亲赴庇能劝请她回国，但未能成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陈夫人应孙科之请，毅然回国。当时国内处于宁粤分裂状态，孙科参加了广州国民政府（即西南政府），陈夫人在广州东山给孙科照料家务，养女孙容就读于广州河南真光女子中学。

1936年发生“六一”事件（即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反对南京政府，不久被南京政府平定，蒋介石以战胜者的心情来到广州，并接受居正（当时任司法院长）的意见，亲自慰问陈夫人，还送上10万元作为她的建房和养老之用。但房屋没有建成，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此时，孙容已经赴美留学，陈夫人不顾年事已高，奋勇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积极宣传我必胜、敌必亡的道理。为表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坚定信念，她的5个外孙，均由她取名为必胜、必兴、必达、必成、必立。她的这种“寸心至死如丹”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1941年，陈夫人随女儿孙容、女婿孙乾一家人居住广东韶关，抗战胜利后，回到故乡中山县石岐居住。

抗战胜利不到一年，内战发生。陈夫人于1949年随女儿一家赴香港，住九龙界限街。女婿孙乾脱离军界，经营格兰饭店于尖沙咀。孙乾和孙容的5个儿子均留学美国，分别取得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对外婆颇具孝心。1957年春，孙容患癌症病逝，陈夫人因忧伤过度，导致行动艰难，靠轮椅代步。1960年，这位英勇、慈祥、俭朴的巾帼英雄与世长辞，终年87岁。陈夫人的治丧仪式颇为简单，不登报，不发讣告，匆匆地安葬于荃湾华人墓地。

1986年，北京隆重举行纪念孙

中山先生诞生120周年大会，孙科的女公子孙穗华、孙穗英、孙穗芳，孙乾的几个儿子均回国参加。会后不久，孙乾由美回港，将岳母的遗骨移至中山县翠亨村的北山头，面向大海安葬，以示她素具大海般之胸怀。妻子孙容的遗骨亦同时迁葬于此。

李以助将军在有关资料中还特别指出，抗战期间他曾有幸在韶关晋见过陈夫人，并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交谈，曾谈及陈夫人作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为推翻清朝，历尽千辛万苦，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推翻清王朝后，中山先生当了民国总统，她竟离他而独居，是不是他有负于她？对此，陈夫人明确地指出：

“我出身在一个清贫的家庭，父亲虽是个郎中（医生），但难以维持家中数口人的生活，那时只是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命该如此。自从认识中山先生以后，他给我讲了很多的道理，我才认识到我们的贫困是腐败的清政府造成的，因此立志跟随他革命，推翻清朝。后来，中山先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就是说，我参加革命的愿望也完全实现了。我非常明白，中山先生这以后的重担是非常艰巨的，甚至不亚于推翻清朝，因此，在他身边必须有位有才能的贤内助来辅佐，以减轻他的负担。基于这一考虑，我自愿离开他，并不是他抛弃我。我自离开他以后直到今天，义无反顾，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对中山对我是有利的，对国家对民族是有利的。既投身革命，是不可有私心妄念的。”

陈夫人指出：“中山一生，博爱为怀，一无所私，二无所畏，他壮志未酬而早逝，实为国人之大不幸。他在北京患病时，我心上十分思念，坐卧不宁，时刻祝愿他转危为安，他辞世后，我设坛遥祭七天七夜，祈祷他安息于九泉。”

陈夫人还曾一再向李将军强调：“回忆总是与我相伴，它给我以很大的快乐。当年我在红楼跟随中山先生进行反清斗争，迄今已过几十年。几十年来，世异时移，几度沧桑。当年我在海外接待过、帮助过、联系过的革命党人及青年，如陈其美、黄兴、蔡锷、李烈钧、林森、陈炯明、廖仲恺、何香凝、许崇智、汪兆铭（汪精卫）、居正、蒋介石、邹鲁等，他们在反清、反北洋以及东征、北伐中，功不可没，真正忠诚于中山的事业。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有人背叛了中山的遗志，甚至当了汉奸，怎不令人痛心啊！……”

写到此，又激起了我对刚去世不久的文强将军的思念。在他临终前的一个月还以97岁高龄给我赐题了“祖国尚未统一、同志仍须努力”的墨宝，以鼓励我发扬中山先生的黄埔精神，去尽力做些有利于促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的工作。李以助将军现定居香港，也已步入耄耋之年。我想，这样的老人，台海两岸，五洲大地，寥若晨星，正在日渐凋零。他们了解的历史，可能会随他们一同逝去。常常听到“抢救”文物之说，其实，应该抢救的，还有老人们记忆中的历史。这或许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吧！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孙容在就读美国夏威夷大学前，就与孙乾热恋，海誓山盟。他们两人在孙家是姑侄关系，孙乾是中山先生的兄长孙眉的孙子，长辈们尤其是卢夫人反对他们成亲。由于两人毫无血缘关系，后来由孙科出面玉成其婚事。他电告孙容前住意大利同正在此留学的孙乾结婚，并请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主持婚礼。婚后，孙容改名苏仲英，两人更加恩爱。不幸的是孙容在44岁时，与世长辞。

（责编：谷良 贵校：高飞）